美国清前期研究的新趋势

（美）柯娇燕（PamelaCrossley）高翔译

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清史学界人数最多。清代历史很漫长，人们现在对清前期有着特殊的兴趣。“清前期”，我们一般指17世纪，或者更确切地说，指从努尔哈赤起事到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的百余年时间。因为清史领域是如此广阔繁复，短短几页不可能一览无余，所以，这里讨论的只限于清前期研究的几个趋势，主要介绍作为一个研究方面的“明清之变”的出现、对政治史的新重视、以及对清代特殊文化和社会研究的开始。

许多美国学者都为自己和中国同行在断代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所震动。在我们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几十年前相比远不为重，事实上，我们认为以鸦片战争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难以使人信服，因为它倾向于把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作为中国历史的决定力量。今天，绝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问题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的历史发展模式，特别是人口、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其结果导致人们在研究中倾向于把清前期和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联系起来，而不是和“亡明”时期相联系。美国史学家一般不认为严格的断代线是有用的，他们倾向于根据自己打算分析的特殊事件限制其年月界限。当然，最终的目的是把全部事件和主要的历史变化相联系，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希望他们的专论将有助于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提出新的全面解释。

考察明清历史联续性发展状况的重要性，使“明清之变”成为研究的特殊焦点。很早以前，世界许多地方的史学家都强调明清时期专制君权的普遍集中趋势，认为从晚明到清前期六部和官僚制度，正统的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以及封建贵族的普遍作用都持续发展。然而，其他史学家却强调非联续性因素，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国内交通以及与边疆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讲，中国的17世纪是一个联续性发展的时期还是非联续性发展的时期？换句话，根据弗雷德克·魏克曼近著的说法（该书使其意思变得非常简明）：在中国，清朝的建立是真正代表着“帝国秩序的重建”抑或与此相反，标志着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在美国，历史学家都带着这个问题考察“明清之变”的各个方面。

应该指出的是，前几代美国学者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兴趣很少。其原因不难发现：由于只注意外国人在中国的经历与事务，学者们只能主要依赖西方文献，沉醉于想入非非的自我吹嘘，认为西方人能够导致象中国这样的伟大国家发生走向现代化的深远变革。当然，在19和20世纪，外国帝国主义作为中国许多变化的影响因素，这是明显的事实。但是，现在我们的历史观点和研究技术都已成熟，我们知道，从终结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本身正是其一切根本变化的源泉。逐渐地，我们的兴趣转向清前期和中文文献上。我们寻求中国现代变化更深层的原因而不局限于从外国人的日记和外交信札中所得来的那点知识。清前期历史研究是由已故的弗兰斯·米迦尔（华盛顿大学）《中国满族统治之起源》（1965）一书开拓的，这个小小的领域为约纳单·D·①斯宾思（耶鲁大学）、小约翰·E·韦尔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罗伯特·H·G·李（斯通利·布鲁克纽约州立大学）、劳伦斯·D·克斯勒（北卡罗来纳大学）以及所有在17世纪课题上做着重要工作的人远远发展。

“明清之变”研究领域的进展相当缓慢，约纳单·D·斯宾思和小约翰·E·韦尔斯编辑出版的文集《从明到清》（1979年）是其结晶。学者们从方志、传记到制度研究，运用多种技

术，试图就明朝地方势力抵抗的失败以及清朝征服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作出评价。这些学者中，至少有三人后来继续发表关于17世纪中国国内历史的高质量著作。吉雷·敦尔林（阿默斯学院）在《嘉定屠杀》（1981年）一书中分析了在明朝绅士组织地方防御能力上派系之争的后果，林莱恩·司徒威（印第安纳大学）在《南明》（1984年）一书中叙述了明朝在清军占领北京以后，希图继续生存的努力。但是，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弗雷德克·魏克曼（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宏伟事业》（1985年）一书。该书涉及范围很广，完成了一个困难的工作，即叙述了明朝的衰落、李自成的兴亡以及清朝的崛起这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当然，魏克曼不可能象敦尔林、司徒威以及其他17世纪专家那样深入地讨论问题，但《宏伟事业》在以下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把一批名气较小的学者的初步成果介绍给了广大史学读者，其次，它第一次用英语向我们叙述了17世纪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写过明清之变历史文章的美国学者还有：斯蒂芬·哈雷尔（华盛顿大学）、大卫·E·凯利（奥伯宁学院）、吉姆斯·李中清（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以及其他学者。

上面提到的学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必然对明清之交价值与观念的延续问题感兴趣。其他学者则更密切地注视着清前期知识分子的命运，魏克曼和威廉·S·阿特韦尔（侯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追随他们的有威尔德·帕特森（普林斯顿大学）、米祖文（国会图书馆）、艾利生·布莱克、阿兰·巴尔（门兰学院）等人，这些人都是美国不断增加的清前期专家中的姣姣者，他们受着传统和现代中国学术的深刻影响。

上述学者及其同事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在明清之际维持中国基本政治秩序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但是，作为一个学生就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政治系统在如此巨变之时仍足以自我维持，那末导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样，这些用新的眼光考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和经济事件的研究工作就有了广阔的含义。他们希望对17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进行新的比较研究，在世界史上，那被称为“前现代化”时期。已故史学家约瑟·勒文逊（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曾对此作过早期的、但不完全成功的努力，他著有《欧洲的扩张与亚洲的相反例子》。史学家威廉·S·阿特韦尔是对17世纪流通与贸易发展作现代研究的开创性学者之一，他的工作对魏克曼和其他许多学者产生了影响，有助于人们把前现代化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纳入世界历史的总图画之中。世界史学家或世界史学理论家如伊曼缪尔·屋勒斯汀，马歇尔·沙宁斯，泰尔柯特·巴森斯和已故的弗尔兰德·布劳德尔、卡尔·朴兰弈经常因其对中国历史的浅薄了解受到中国专家的批评。现在，在寻求把中国发展置于前现代化时期世界总模式的方法上，美国史学家如阿特韦尔、R·王国彬。（欧依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显示出和其他学者如沛尔、和宁·曹努（法国）、路易斯·德米尼（德国）。S·A·M·阿德谢德（新西兰）等人联合的兴趣。

另外一些清前期专家和“联续”学派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对17世纪史实的研究实际上属于另一种模式，他们对清前期政治史作出了新的评价。和明清之变学者不同，他们倾向于更多地注意17世纪的非联续性因素，弗兰斯·米迦尔的《满族统治之起源》标志着这个团体的产生。尽管米迦尔看到了满族进入中国以前被人称着“汉化”的重要性，这组清前期专家仍重视东北环境对帝国发展的重要作用。的确，他们试图怀疑所谓“汉化”的意义，并且对其作用只从理论上找到些须证明。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简乔德·罗丝1975年在哈佛的论文《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是第一篇叙述1636年以前后金政治史的英文文章，其材料主要基于辽东满文档案，魏克曼承认罗丝的文章对其《宏伟事业》具有重要影响。清前期政治史中，令

人感兴趣的其他领域是八旗制度、汉军八旗、影响清朝决策的议政传统，皇太极时帝制的创立、满族和蒙古、西藏的文化与政治关系。布韦斯顿·霍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1977年）是一部重要的制度史著作。从这个角度研究的其他史学家包括已故的约瑟·弗莱彻尔（哈佛大学）、已故的大卫·法奎赫尔（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山姆·M·格纳帕尔、菲力浦·伍德罗夫、柯娇燕（达幕斯学院）和一大批在各大学的研究生。一般说来，这批人受日欧学术界的影响和受中国学者的影响不相上下。

对清前期历史需要追踪研究，特别是阅读满文，这在美国备受重视。不幸的是，我们失去了两个天才的具有杰出语言才能的历史学家，约瑟·弗莱彻尔和大卫·法奎赫尔，他们于1984年不幸去逝。现在，年轻的学者和研究生都抓紧时间从老教师那里学习这门技术。几年来，美国学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如比需斯·S·巴勒特勒(耶鲁大学)警告说，未译成汉文的满文数量之大，以致于如果我们真的打算懂得清史，就不能予以忽视。但是，阅读满文只是处理中国历史文献全部问题的很小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正确应用中国材料的真正方法论。到目前为止，西方中国问题学术界的所谓革新不过是接受为研究欧美历史而发展起来的技术，诸如“编年”方法的派生方法。但是，“编年”及其派生方法适合中国文献吗？谁能否认在欧洲社会材料和中国官僚材料的起源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有人可能还会进一步问，中国的社会史是否有许多“非政治的”重要材料？美国许多年轻学者把数学方法引入他们的工作，这有些苛刻但很重要。不过，他们并没有为解决更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作出重要努力。现在，学者们又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关于中国社会最受尊敬的学者G·威廉·斯金那在其近著中就提出了有关建议。目前，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美国学者都感到自己的研究因缺乏处理中国文献的正确方法而受阻碍。截今为止，对已经发现的中国文献来说，还没有满意的途径去适应研究西方历史所应用的精确方法。

自然，对许多学者来说，社会史仍然意味着依靠传统的资料渠道，许多是关于清前期人民生活的趣闻逸事。这些材料将传统精英囊括其中，因为他们热衷于记录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然而，要了解“普遍群众”依很困难，特别是在清前期。约纳单·D·斯宾思的《王氏之死》(1978)致力于揭示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他的方法富有创新性，涉及到地方长官的著述、当地的房子、蒲松龄的小说。这个工作非常引人注目，但许多学者感到不满意，因为斯宾思依靠的材料可能并不完全可靠。而且，他所留意的只是居民中的较小部分。然而，此后关于清前期人民生活的研究并未取得较大进步。当然，新方法是有前途的。在美国，关于中国民间文化整个领域的研究发展很快，通过对民间戏剧、街道艺术、民间宗教、民间会社、民间教育、司法案件和经济发展的新研究，我们可以对这个时期普通群众的生活得到直接的印象。毫无疑问，这也包括对边疆集团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兴趣，对满族的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满语外，宗族组织、萨满教、口头文学影响满族人民世界观的方式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新课题。对清代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研究无疑是未来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不管这些社群生活于农村、草原还是内地城市，他们经济状况和政治观点的变化都将告诉我们中华帝国后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松筠的《老人一百二十沟事录》在美国已经再版（1981），它是18世纪的作品，却提供了一些满族在17世纪的民俗材料。这也是从17世纪过渡到更严密的18世纪研究，从清前期过渡到中期的例子。因为早些时候，美国学术界的一般模式是从19世纪跳到17世纪，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来说，18世纪某种程度上仍是有待开发的领域。除了地方史研究部分或全部包

括18世纪外，早期18世纪研究最著名的是大卫·S·李维森（斯坦福大学）对和坤的简要考察，塞拉斯·吴修良（波士敦学院）和黄培（羊斯敦州立大学）对雍正的研究，还有哈拉德·卡恩（斯坦福大学）对乾隆传记的研究，以及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文。对了解18世纪群众反抗原因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是菲力蒲·A·库恩（哈佛大学）的《清代的反抗及其压制》(1964年)，这一研究成果被苏珊·拉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山东的反抗》（1981年）一书所发展。一般地说，极其重要的乾隆朝以其时间漫长，资料浩瀚使一些学者产生畏难情绪，虽然如此，它却是清代发展史上可缺少的环节，学术界研究18世纪的浪潮正在兴起。在本杰明·A·艾尔曼（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从哲学到语言学》（1984年）以及R·肯特·盖（华盛顿大学）的《皇帝四宝》（1987年）两书中，这个时期的学术史又重新讨论起来。迈德宁·客林（哥伦比亚大学）的《官家的银两》属于经济和社会史范畴，苏珊·拉昆和伊夫林·S·罗斯基（匹兹堡大学）的《18世纪中国社会》》(1887年）提出了社会史方面的新观点。比雷斯·S·巴勒特勒即将完成的关于军机处的专著想来是一部重要的政治史著作。其他对18世纪兴趣日增的学者有：菲力浦·A·库恩、威廉·F·罗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吉姆斯·李中清、罗伯特·吴、戴安·木雷（圣母大学)、皮特·波都（马萨诸塞技术学院）、波尔·S·罗普（克拉克大学）、巴题沙·埃比雷（厄巴纳—香巴尼伊利诺斯大学）、罗伯特·P·甘德拉（美国海洋贸易学校）、王业建（肯特州立大学）、迦洛特·弗斯（长滩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大卫·E·凯利和柯娇燕，等等。

还有许多领域我未能提及，其中包括地方史、文学史、及批评史、妇女研究、艺术和建筑史、科学史、农业、价格及商业史、国际关系等。这些都是极重要的研究领域，我对那些研究工作未被我介绍的美国学者表示歉意。必须强调的是，美国的清史领域博大繁复，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进步依赖于国际学术交往。我们认为，没有美中学术界的紧密联系，双方学术发展都会受到限制。我们密切注视着中国学术界的动态，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同行对我们的工作的反应。外国观察家如德·道奎威利和克锐斯宾义曾对美国人的自我认识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对全面了解中国的发展作出成绩。

---

①其英文音译是Emu tanggoorin saRda—igisun sarRyan